

馬列主義叢書

59560

列寧著

蘇維埃政權底
當前任務



外國文書出版局印行

一九五〇年莫斯科

59560

！來起合聯，者產無界世全

著 寧 列

務任前當底權政埃維蘇



行印局版出籍書文國外
科斯莫。年〇五九一

明聲局版出

本版蘇維埃政權底當前任務
一書，是按馬恩列學院所編
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莫
斯科，一九四六年版）譯出。

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底國際狀況與

社會主義革命底基本任務

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由於達到了和平，——雖然是極其苛刻和極不堅固的和平，——就能够在相當期間內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到社會主義革命之最重要和最困難的方面，即集中到組織任務上來。

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六日在莫斯科舉行的蘇維埃非常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決議案（註）第四段（或第四部）中，——即在論勞動者底自我紀律，以及無情地反對混亂現象和搗亂組織現象的這一段（或這一部）中，已經將這個任務向一切被壓迫勞動羣衆明顯而確定地提出來了。

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所已得到的和平之所以不穩固，自然不是由於這共和國現在彷彿圖謀恢復軍事行動；——除資產階級反革命派及其應聲虫（孟什維克等等）外，沒有一個頭腦健全的政治家曾想到這種事情。和平之所以不穩固，是由於在東西兩方與俄國接壤的，擁有強大軍力的帝國主義國家們的主戰黨，隨時能佔得上風，這些主戰黨因看見俄國暫時衰弱而垂涎，並且是受着仇視社會主義和酷嗜搶劫的資本家們所慫恿的。

在這種情勢下，對於我們說來，和平之真實的而不是紙上的保證，只是由於帝國主義列強間有已達到最高限度的爭執，其表現，一方面是西方國家間帝國主義戰爭之重新繼續進行，另一方面是日美互爭太平洋及其沿岸統治權之極端尖銳的帝國主義競爭。

很明顯的，防禦力如此薄弱的我們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是處於非常不穩固而絕對危急的國際狀況中。必須把我們的一切力量極度緊張起來，以利用全部客觀情勢所給予我們的這個暫息期間，來醫治戰爭所禍及俄國整個社會機體的極重創傷，來達到國家底經濟高漲，沒有這個條件，則國防力之多少嚴重的增高，都簡直無從說起。

同樣很明顯的：我們對於西歐那因為種種原因而遲遲尚未爆發的社會主義革命，究能給予何種嚴重協助，這就全看我們解決我們面前組織任務的程度如何而定。

使我們當前首要的組織任務得以順利解決的基本條件，就是要民衆底政治領導者，即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黨員們，其次是勞動羣衆中一切有覺悟的份子，能夠完全理解以前各資產階級革命和現在社會主義革命間在這一方面的根本區別。

在以前資產階級革命中，勞動羣衆底主要任務，是在於實行消滅封建制度、帝制政體和中世紀關係這種消極的或破壞的工作。而組織新社會之積極的或建設的工作，則是由佔人口少數的有產者或資產者來執行的。他們之所以能夠不顧工人和貧苦農民底反抗而比較容易地執行此種任務，這不僅因為當時受資本剝削的羣衆所作的反抗，由於其自身的散漫性和不開

通而表現得極其微弱，而且也因為那建築在無政府狀態上的資本主義社會，有了在深度和廣度方面都是自發發展着的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爲其基本的組織力量。

反之，無產階級和它所領導的貧苦農民，在任何社會主義革命中，因而也在已由我們於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開始進行的俄國社會主義革命中的主要任務，却是積極的工作或建設的工作，就是要把包括千百萬人生存必需品之有計劃生產和分配的這一極繁雜而極精密的新組織系統辦理就緒。這種革命，只有當人民大多數，首先是勞動羣衆大多數表現出有歷史意義的獨立創造精神之下，才能順利實現。只有在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能夠表現充分的自覺性，理智性，犧牲精神和堅定精神的情形之下，社會主義革命底勝利然後才有保障。我們建立了使被壓迫勞動羣衆能夠積極參加獨立建設新社會事業的新式國家，即蘇維埃式的國家，但這還只解決了困難任務的一小部分。主要的困難是在經濟方面：即對產品底生產與分配上實行普及全國的最嚴格的統計與監督，提高勞動生產率，使生產在事實上社會化。

現時已在俄國執掌政權的布爾什維克黨底發展過程，特別明顯地表明構成目前政局特點的現時歷史轉變究竟何在；這個歷史轉變，使蘇維埃政權必須抱定新的方針，即是要以新的方式來提出新的任務。

任何負有遠大使命政黨底第一個任務，原是說服大多數民衆，使他們相信這個黨底綱領和策略正確。無論在沙皇制度時代或在切爾諾夫輩和策烈鐵里輩與克倫斯基和基什慶（註二）妥協的時期中，這個任務都會佔着首要地位。現時這個任務雖然還遠未完成，而且無論何時都不會澈底完成的，但它大體上是已經解決了，因為在莫斯科舉行的最近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已經無可置辯地證明：俄國大多數工農顯然是站在布爾什維克黨方面的。

我們黨底第二個任務，原是奪取政權並鎮壓剝削者底反抗。而這個任務也還沒有澈底完成，並且不能加以漠視，因為帝制派和立憲民主黨人（註三）及其應聲蟲和走卒孟什維克與右派社會革命黨人，仍然繼續在企圖聯合起來，以求推翻蘇維埃政權。可是，鎮壓剝削者反抗的這個任務，已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到（大約說來）一九一八年二月間，或是到博加也夫斯基投降的時期內，便大體解決了。

現時提到了日程上而構成目前時局特點的，有第三個迫切任務，這就是組織對俄國的管理。當然，我們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底第二天，就已提出並努力解決過這個任務，可是直至剝削者底反抗還採取公開的國內戰爭形式的時候，這個任務，不能成爲主要中心任務。

現在它已成爲這樣的任務了。我們布爾什維克黨已經說服了俄國。我們奪得了俄國——從富人手中奪給窮人，從剝削者手中奪給勞動者。現在我們應當管理俄國。目前時局底

全部特點，全部困難，就在於要明瞭由說服民衆和用武力鎮壓剝削者的主要任務轉到管理的主要任務這一過渡底特徵。

社會主義黨在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得以大體完成了奪取政權和鎮壓剝削者的這一事業，得以緊緊接近到管理的任務。我們務須成爲確能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底這個最困難（而且是最高的）任務的人。應該澈底想清楚：要有成效地實行管理，除了善於說服民衆以外，除了善於在國內戰爭中獲得勝利以外，還須善於實際地進行組織工作。這是一個最困難的任務，因爲這裏是要用新方式去組織千百萬人生活上最深刻的經濟基礎。而且這是一個最高的任務，因爲只有在解決這個任務以後（在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解決以後），才可以說，俄國不僅成了蘇維埃共和國，而且成了社會主義共和國。

現時的總口號

由於極端苛刻而不穩固的和約，由於戰爭和資產階級底統治（其代表爲克倫斯基和擁護他的孟什維克以及右派社會革命黨人）所遺留給我們的極痛苦的經濟破壞、失業和飢荒，——由於這一切所造成的上述客觀情勢，便必然產生出廣大勞動羣衆底極端疲憊，甚至精疲力竭的現象。他們極力要求——也不能不要求——相當的休息。現時擺在日程上的任務，就是

要：恢復被戰爭和資產階級統治所破壞的生產力；醫治由戰爭、軍事失敗、投機業和資產階級企圖恢復已被推翻的剝削者政權等所造成的創傷；復興國內經濟；牢固地維持起碼的秩序。蘇維埃政權現時也只有它不顧資產階級、孟什維克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底反抗，而在實踐上正是解決維持社會制度的這些初步和最初步的任務，才能使俄國穩固地過渡到社會主義。

——這一點，看來好像是很奇怪的，而其實因為上述種種客觀條件，成為毫無疑義的了。由於現時情勢中具體的特點，由於蘇維埃政權及其關於土地社會化與工人監督生產等法令存在的情形下，實際解決這些最初步的任務與克服走向社會主義之初步工作中組織上的困難，這在現時乃是一物底兩面。

精確而誠實地計算金錢，節省經濟，不懶惰，不盜公肥私，在勞動中遵守最嚴格的紀律——正是這些口號，從前被資產階級用來掩飾自己這剝削階級的統治地位時，曾為革命的無產者所正當譏笑過的，而現時在推翻資產階級以後，却已變成目前迫切的主要的口號了。一方面，勞動羣衆切實執行這些口號，便是挽救被帝國主義戰爭和帝國主義強盜們（以克倫斯基為首）弄得半死半活的國家的唯一條件；另一方面，由蘇維埃政權，用自己的方法，根據自己的法令來切實執行這些口號，又是社會主義徹底勝利所必要的和足夠的條件。那裏雖然還有將這些似乎是極其「陳腐」和極其「庸俗」的口號當作首要任務的人，正是不能理解這道理。我們這個小農國家僅在一年以前才推翻沙皇制度，僅在上半年以前才肅清克倫斯基

之流，當然遺留下了不少的自發的無政府主義，而與每一長期反動戰爭相伴隨的殘忍行動和野蠻行為更把這種無政府主義加強了，同時還發生有不少的失望情緒和無端憤恨情緒；如果再加上資產階級走狗們（孟什維克，右派社會革命黨人等等）底挑撥政策，那末，非常明顯，優秀的和最有覺悟的工農要使羣衆底情緒完全轉變，並引導他們過渡到正確的、堅韌的、有紀律的勞動，就必須有如何長期堅強的努力。只有由貧民羣衆（無產者和半無產者）實現的這種過渡，才能完成對資產階級，尤其是對最頑強和人數衆多的農民資產階級的勝利。

與資產階級鬥爭的新階段

資產階級在我國已被擊敗，可是還沒有根除，沒有消滅，甚至於還沒有澈底摧破。因此，在日程上便提出反資產階級鬥爭底新的更高形式，由繼續剝奪資本家的極簡單的任務，轉到一個更複雜和更困難得多的任務，就是要造成使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再不能產生的條件。很明顯的，這個任務是要高得不可測量，如不解決這個任務，那也就是說，還沒有社會主義。

拿西歐革命底規模來比較看，我們現時大約處在一八七三年和一八七一年（註四）所達

到了的水準。我們完全有權來以達到了的這種水準而自豪，並且在一方面，我們毫無疑義還走得更遠一些，這就是：我們在全俄境內宣告並成立了最高式樣的國家——蘇維埃政權。但是，我們絕對不能因已得的成績而自滿，因為我們僅僅開始過渡到社會主義，而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做到什麼有決定意義的事情。

有決定意義的事情，就是對產品底生產和分配上建立最嚴格的全民統計和監督。然而，在我們已從資產階級手裏奪來的那些企業和經濟部門中，我們還沒有實行統計和監督，若不做這一點，便絕對談不到去實現社會主義的第二個同等重大的物質條件，即在全國範圍內提高勞動生產率。

因此，決不能以繼續向資本進攻這個簡單公式來決定現時的任務。資本雖然還沒有被我們徹底擊敗，還無條件地必須向勞動者底這個敵人繼續進攻；可是這樣來決定任務會是不精確的，不具體的，其中並沒有估計到現在時局底特點，即是爲了保障往後的進攻能取得勝利起見，便應當在目前「停止」進攻。

關於這點，可以拿我們在反資本戰爭中的狀況與一個常勝軍隊底狀況作一比較來加以說明，譬如這個常勝軍隊，已奪取了敵人一半或三分之二的領土，此時它却不能不停止進攻，以便聚集力量，增加武器彈藥儲藏，修理並鞏固交通線，建築新的軍需庫，調集新的後備軍等等。在這種條件之下，停止進攻，正是常勝軍隊爲了奪取敵人其餘的領土，即是爲了取得

完全勝利所必需的。現時客觀情勢所要求於我們的，正是要這樣「停止」向資本進攻，誰不懂得這一點，那他就完全不了解現時的政局。

當然，只有加上括弧，即只是用比喻的說法，才能講到「停止」向資本進攻。在通常的戰爭中，可以下停止進攻的總命令，可以真正停止前進。而在反資本的戰爭中，却不能停止前進；要我們放棄繼續剝奪資本，這是決然談不到的。這裏所講的，是改變我們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底重心。迄今以前，是直接剝奪剝奪者的設施，佔着首要地位。現時佔着首要地位的，則是在資本家已被剝奪的那些企業和其餘一切企業中組織統計和監督。

如果我們在現時，仍然想用以前的速度繼續剝奪資本，那我們就一定會遭受失敗，因為每一個肯費心思的人都知道，我們組織無產階級的統計和監督的工作，顯然落後於直接「剝奪剝奪者」的工作。我們現在只有用一切力量去辦好組織統計和監督的工作，我們才能解決這個任務，才能彌補所沒有做到的事情，才能在反資本的「戰役」中獲得勝利。

我們承認應該彌補沒有做到的事情，但這是否就等於承認以前犯了某種錯誤呢？絕對不是的。我們再拿戰爭作比喻吧。如果能夠單用輕騎隊擊潰並壓退敵人，那就應該這樣幹去。但如果這個動作祇能在相當限度內獲得戰果，那末，在這個限度以外，自然要調來重砲隊。我們承認現在應彌補以前沒有作的調來重砲一事，這絕對不是承認輕騎隊底勝利攻擊是一個錯誤。

資產階級底奴僕們常常責罵我們採用了「赤衛隊」來攻擊資本。這種責罵是荒謬絕倫的，祇有財庫守門狗才說得出口。因為用「赤衛隊」攻擊資本，是當時各種情況所絕對要求的：第一，當時資本曾以克倫斯基和克拉斯諾夫、沙溫可夫和郭茨、杜托夫和博加也夫斯基等人為代表，實行軍事反抗（而黑格啓科利現時仍在作這種反抗）。要打破軍事反抗，除了用軍事手段以外，別無他法，赤衛隊正是作了這一使勞動者和被剝削者擺脫剝削者壓迫而得到解放之最高尚最偉大的歷史事業。

第二，當時我們其所以不能將管理方法擺在首要地位來代替鎮壓方法，還因為管理的藝術並不是人們生來就有，而是要從經驗中得來的。當時我們還沒有這樣的經驗。現在却已經有了。第三，當時，我們還未能使具有各種知識和技術的專門家受着我們的支配，因為他們或者參加在博加也夫斯基之流底隊伍中作戰，或者還能用怠工方法進行有系統的頑強的消極反抗。現在我們已經把怠工打破了。「赤衛隊」對資本的攻擊收到了成效，獲得了勝利，因為我們既戰勝了資本底軍事反抗，又戰勝了資本底怠工反抗。

這是不是說用「赤衛隊」攻擊資本在任何時候都是適當的，在任何情勢之下都是適當的，此外我們再沒有別種同資本作鬥爭的方法呢？如果這樣設想，那就是幼稚病。我們雖用輕騎隊獲得了勝利，可是我們也有重砲隊。我們雖用鎮壓方法獲得了勝利，可是我們也能夠用管理方法來取得勝利。當情勢改變的時候，應該善於改變反對敵人的鬥爭方法。我們連一

分鐘都不會拒絕用「赤衛隊」方式去鎮壓沙溫可夫輩和黑格啓科利輩先生們以及其他一切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派。可是我們並不會如此蠢笨，竟在須用「赤衛隊」攻擊的時代大體已告結束（而且勝利地結束了）的時候，在由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利用資產階級專門家來耕耕土壤，使這土壤上絕不能再生長出任何資產階級來的這種時代已經到臨的時候，還將「赤衛隊」的攻擊手段擺在首要地位。

這是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特別時代，或者更確當些說，這是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特別階段，所以爲了澈底戰勝資本起見，就要善於使我們的鬥爭形式適合於這種階段底特別條件。

沒有具有各種知識、技術和經驗的專家們指導，便不能過渡到社會主義，因爲社會主義需要有廣大羣衆自覺地在資本主義已達到的成績基礎上前進到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社會主義應該照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方法，——更具體些說，照蘇維埃的方法，——來實現這種前進步驟。而專門家，因爲受了過去培養他們成爲專門家的那種社會生活底全部環境的影響，其大多數必然是資產階級的。如果我們無產階級在已奪取政權後，很快就在全國範圍內解決了統計、監督和組織的任務（當時由於戰爭和俄國落後底緣故，這是無法實現的），那末，我們在打破了怠工以後，就能用全盤統計和監督的方法，而使資產階級的專門家完全服從我們。由於一般統計和監督工作，相當「遲延」未作，所以我們雖然已經戰勝了怠工，但還沒有造成那種使資產階級專門家受到我們支配的環境；大多數怠工者雖「到

「職服務」，但國家要利用優秀的組織者和極高明的專門家却祇有兩種方式：或是按照舊的方式，資產階級的方式（即付給高額薪俸），或是按照新的方式，無產階級的方式（即造成自下的全民統計和監督的環境，有了這種環境，就能必然和自然使這些專門家服從，並吸收他們來參加工作）。

現時我們却不得不來採用舊的資產階級的方式，同意付給極高明的資產階級專門家以很高的「酬」金。一切熟悉情形的人們，都知道這點，可是並不是大家都仔細思考到了無產階級國家採用這種辦法有什麼意義。顯然，這個辦法是一種妥協，是離開巴黎公社和任何無產階級政權底原則的，這些原則要求把薪俸降到中等工人工資的水準，要求在事實上而不是在口頭上同陞官發財思想作鬥爭。

不僅如此。這種辦法，顯然不只是停止在相當部門內，在相當程度內向資本進攻（須知資本並不是一批貨幣，而是一定的社會關係），而且還是我們社會主義蘇維埃國家政權向後退了一步，因為這個政權一開始就宣佈過並實行過把高額薪俸降低到中等工人工資水準的政策。

自然，資產階級底走卒，尤其是像孟什維克，新生活派（註五）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這班下賤奴僕，會因我們承認後退一步而來幸災樂禍地譏笑我們。可是我們絕對用不着去理會這種譏笑。我們應該研究走向社會主義這一極端困難的新道路底特點，不要掩蔽我們的錯誤和弱

點，而要努力及時地彌補尚未做到的事情。我們用非常高的薪金來吸收資產階級專門家一事是離開公社原則，如果我們對羣衆隱瞞這點，那就無異是墮落到資產階級政客的水準，並欺騙羣衆。公開宣佈我們怎樣和爲什麼後退了一步，然後公開討論，有什麼方法可以彌補沒有作到的事情，——這就是教育羣衆，並在實際經驗上同他們一塊來學習建設社會主義。在歷史上任何一次勝利的戰役中，勝利者未必沒有犯過個別的錯誤，未必沒有遭過局部的失敗，未必沒有在某某方面在某某地方暫時退守過的。而我們所舉行的進攻資本主義的「戰役」，比較最困難的戰役還要困難一百萬倍，如果因爲部分和局部的退守就垂頭喪氣，那便是愚蠢而可恥了。

現在從實踐方面來考察問題吧。假設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需要一千個具有各種知識、技術和實際經驗的頭等學者和專門家來指導國民勞動，以謀國內經濟儘可能迅速地高漲起來。假設這些「頭等明星」——自然，其中大多數，愈是狂烈地叫喊工人們腐化，則他們受資產階級道德的腐化也就愈深——每人每年應付以二萬五千盧布。假設這個薪金總額（二千五百萬盧布）還要加多一倍（假定因成績特別優良和特別迅速地完成了組織上和技術上最重要的任務，還要給以獎金），或者甚至再加多三倍（假定還要聘請幾百個要求更加苛刻的外國專門家）。試問每年花費五千萬或一萬萬盧布來根據最新技術和科學改組國民勞動，能不能說這項費用對於蘇維埃共和國是過多的或擔負不起的呢？當然不能這樣說。絕大多數覺悟的工農會贊成這種費用，因爲他們從實際生活中知道：我們底落後性使我們不能不受到千

百萬盧布的損失，然而我們在組織、統計和監督方面，則還沒有達到能引起資產階級智識界「明星」全體自願來參加我們工作的那種程度。

當然，問題也有它的另一方面。高額薪金底腐化作用影響到蘇維埃政權（尤其是因革命迅速成功時，不會沒有相當數量的野心家和騙子混入這個政權，他們連同各種委員當中那些庸碌之輩或毫無良心的人，是會甘願去充當盜竊國庫的「明星」的），影響到工人羣衆，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可是，工人和貧苦農民中一切善於思考和居心誠實的人們，都會同意我們，都會承認：我們無力一舉擺脫資本主義底遺毒，要使蘇維埃共和國免除每年五千萬或一萬萬盧布「貢獻」的負擔（這是因為我們自己在組織全民統計和實行自下監督這事業上落後之故所付出的貢獻），除了自己組織起來，在自身隊伍內整頓紀律，清除自己行列中一切「保存資本主義遺傳」，「遵守資本主義傳統」的人們，即是清除一切懶漢、寄生蟲、盜竊國庫者（現在一切土地、一切工廠、一切鐵路，都是蘇維埃共和國底「國庫」）以外，別無辦法。如果有覺悟的先進工人和貧苦農民能在一年以內，在蘇維埃機關幫助之下，自動組織起來，紀律化起來，振奮起來，並建立起強固的勞動紀律，那末，一年以後，我們便能擺脫這項「貢獻」，而且正是隨着我們工農勞動紀律和組織性所達到的程度，甚至還能更早些：縮減這種「貢獻」。我們工農自己能利用資產階級專門家來更快地學會優良的勞動紀律和極高的勞動技術，則我們就能愈加迅速地免除繳給這些專門家的一切「貢獻」。